双周 学术

元德秀“鲁山之饥”的道德垂范意义

徐韫琪

元德秀传世诗文虽寥寥，但他的高洁操行深刻影响了有唐一代士人。李华《三贤论》记载了元德秀、萧颖士、刘迅三位致力于兴复儒教、拯救时弊的文化名流，前人多从三者共性入手考察开天之际的复古思潮，事实上这三派群体各有不同侧重。元德秀在学术研究的精深程度上似逊于家学深厚的刘、萧，但他以道德修养名高一时，“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在角色定位上，元德秀与“被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若百炼之钢”的刘、萧有所不同，他“处师保之席”“不俟其言而见其仁”，如果说“卿佐”的职责在于协助人主处理具体政务、需具备韬略与妙断，那么“师保”则侧重于润物无声的人格感召，以自身道德实践形塑他者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正所谓“以道纪天下”。史载元德秀早年负母诣长安求举，为政时以诚信感化狱囚、“所得俸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新唐书·元德秀传》），他的高风亮节不仅召唤着当时的一批从游者，还成为有唐一代的精神坐标。后人不断通过诗文追缅鲁山行迹，同时鲁山的形象和地位被逐步抬高，最终被塑造为饥馁而死的“悲情英雄”。那么，元德秀的死因真的是“馁死”吗？如果不是，后人的建构和“误读”又出于何种心理？

两《唐书》及李华《元鲁山墓碣铭》确实述及元德秀去世时“家惟枕履箪瓢而已”的清贫境况及他结庐陆浑后遭遇的饥馑，不过即便身处困窘，也有人予以酒食资助，鲁山更是欣然接受：

秩满，南游陆浑，见佳山水，沓然有长往之志，乃结庐山阿。岁属饥歉，庖厨不爨，而弹琴读书，怡然自得。好事者载酒肴过之，不择贤不肖，与之对酌，陶陶然遗身物外。（《旧唐书·元德秀传》）

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弹琴以自娱。人以酒肴从之，不问贤鄙为酣饫。（《新唐书·元德秀传》）

时属歉岁，涉旬无烟。弹琴读书，不改其乐。好事者携酒食以馈之，陶陶然脱遗身世，涵泳道德。（李华《元鲁山墓碣铭》）

由上可知，“岁饥”的相关叙述是为了突出元德秀逆境中不以俗事挂怀的洒脱与和光同尘的境界，且无论是史书、墓碣铭，还是族弟元结的《元鲁山墓表》，都未提及元德秀馁死，故缺少衣食应不是导致元德秀于天宝十三载辞世的直接原因。然而后人却将鲁山之死与饥馑建立起明确的关联，“鲁山馁死”成为衬托元德秀卓异操行的标志性事件。其肇始或来自肃宗朝中书舍人卢载的《元德秀诔》：

谁为府君，犬必啗肉。谁为府僚，马必食粟。使我元公，馁死空腹。

卢载以其他官僚的奢侈腐败反衬鲁山德行之高，提出鲁山去世时“馁死空腹”。需要注意的是，诔文之要在于“诔其德行，旌之不朽”“铭德纂行，光采允集”（《文心雕龙·诔碑》），其体裁决定了其以颂扬逝者生前的功绩德行为主，褒美甚至夸张之辞在所难免。卢载“馁死空腹”之构思或来自元德秀生前曾处歉岁的遭遇及居所的简朴陈设，作者将之整合并推衍升华，形成“鲁山馁死”的结论。或在卢载看来，越是强调元德秀生活之困窘、死因之有悖人情，越能突出鲁山胸次洒落而无私欲的境界，诔文的反讽意味也更加强烈，同时激发读者强烈的共情，在无形间形成了鲁山馁死的印象。

卢载虽提出鲁山“馁死空腹”，但尚未明确将他与古人并提。中唐以后，文士在渲染“鲁山之饥”时候，多将之比作三代、春秋时身陷饥馑却不改其志的古贤，用以刺时或自警，“鲁山之饥”逐渐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孟郊《吊卢殷》将鲁山与颜渊并提，“耳闻陋巷生，眼见鲁山君。饿死始有名，饿名高氛氲”，强调士人名节之树立。同样是歌颂鲁山之饥，白居易《题座隅》明确将元德秀比作古贤伯夷，并且用小注的形式强调其死因：

伯夷古贤人，鲁山亦其徒。时哉无奈何，俱化为饿殍。元鲁山山居阻水，食绝而终。念彼益自愧，不敢忘斯须。平生荣利心，破灭无遗余。犹恐尘妄起，题此于座隅。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在白居易笔下，关于元德秀死因的叙述反而较前人更为具体？“山居阻水，食绝而终”的细节从何而来？唐人丁用晦笔记《芝田录》中浮现了蛛丝马迹。据陶敏先生考证，《芝田录》成书于咸通末至乾符初，尽管其成书时间晚于乐天诗作，但书中所采之杂文轶事往往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和演绎，其中关于元德秀的事迹记载，不妨视为中唐以来的一种民间的“共识性”观念：

元德秀退居安陆县南，独处一室，去家数十里。值大雨水涨，七日不通，饿死空屋。中书舍人卢载为诔曰：谁为府君，犬必啖肉？谁为辅僚，马必食粟？使我元公，馁死空谷！

元德秀辞官后居于陆浑并于此终老，史书及铭文已有明证，“安陆县南”一说显然为讹传，唐人笔记所载往往真伪间杂，不尽可信。“去家数十里”“七日不通”这些未见于正史及墓志铭的细节看似丰满，实则透露出民间传说“层叠累积”的生成逻辑。正如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分析，史事往往“由简单变为复杂”，这提醒我们对于一些踵事增华、后出转精的历史叙述，应抱有足够警惕。《芝田录》的这则记载不应作为信史看待，却透露唐人对“鲁山馁死”一事“宁信其有”并大力阐扬的心态。同时，在厚古薄今、“人心不古”的观念下，鲁山越是超群拔俗，就越与古人相契，这亦是后人将鲁山与古人并论的内在逻辑。如果说伯夷是上古志士的典范，那么元德秀则被唐代士人视作当代道德模范。白居易之“误读”，即有意将元德秀与“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并论，突出“俱化为饿殍”的两位仁义之士操行之高洁，以其事迹警惕自己荣利之心。与《元德秀诔》相比，此诗进一步渲染鲁山命运的悲剧色彩，抒情意味更为浓重。由此可见，后人通过对鲁山之死的解读、阐发甚至附会，追寻上古至真至纯的人文精神，并逐步构建起与古贤的血脉联系。

行至晚唐，士人对元德秀的崇敬依然真挚浓烈，并在咏叹其道德丰厚之余发掘鲁山行迹中率真本初的一面。皮日休《七爱诗》选取了七位唐代名贤，其中既有房杜、李德裕这类辅国定乱之将相，也有卢徵君、李太白这类傲逸放旷之奇才，元德秀则作为能够“镇浇俗”的“真吏”被歌颂：

吾爱元紫芝，清介如伯夷。
辇毋远之官，宰邑无玷疵。
三年鲁山民，丰稔不暂饥。
三年鲁山吏，清慎各自持。
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
一室冰檗苦，四远声光飞。
退归旧隐来，斗酒入茅茨。
鸡黍匪家富，琴尊常自怡。
尽日一菜食，穷年一布衣。
清似匣中镜，直如琴上丝。
世无用贤人，青山生白髭。
即卧黔娄衾，空立陈寔碑。
吾无鲁山道，空有鲁山辞。
所恨不相识，援毫空涕垂。

皮日休不厌其烦地使用“清”字形容鲁山为官之清介、持身之清慎、生活之清俭，确实抓住了“清”作为鲁山的人格审美特征。一方面，“清”意味着一种“透明感”，亦即《七爱诗》序中强调的“真纯”色彩；另一方面，“清”来自超脱尘俗的气质，主体越过时空与古人相通，带有淳和古雅的意味。苏时学曾指出“夫清岂易言哉？孟子论圣人，而独以清许伯夷，则自伯夷之外，其真清者有几人耶？”（《爻山笔话》卷一二）皮日休不仅将鲁山与伯夷并论，还将古贤忍饥挨饿的细节直接“移植”于鲁山，使其成为古贤的化身。“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或出自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及伯夷“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的典故，诗人以古贤宁死不受不义之物的耿介，衬托元德秀担任鲁山令期间的清慎廉洁，甚至甘愿自苦换来百姓的“丰稔不暂饥”。如此，后人对元德秀的形塑在其真实人设的基础上，又与上古、春秋之贤人融合无隙，其形象愈加具有历史的层次与厚度。

皮日休还融入对元德秀生不逢时的叹惋，“世无用贤人，青山生白髭”的构思恰与孟郊“天地蹇即甚，鲁山道莫伸。天地气不足，鲁山食更贫”（《吊元鲁山》）暗合，正因鲁山之道与天地合德，所以天地之穷蹇使鲁山不得行道，反之鲁山之困顿亦令青山愁添白髭。奇崛的想象背后，是诗人与鲁山作为异代知己的惺惺相惜。元德秀作为中晚唐坎廪士人的自我投射和精神寄托，随着“鲁山之饥”的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元德秀身上的历史厚重感逐渐深化，人们慨叹鲁山生平的同时强化了对自身遭遇的反思和对不公世道的批判，“古”与“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愈发凸显。“援毫空涕垂”的背后，一曲理想主义者的挽歌已黯然奏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唐诗 品鉴④

胜似春光的秋色

——读杜牧诗《山行》

余才林

杜牧是京兆杜陵人，有庐终南山下。入仕以后长期生活在南方，早年为幕吏，曾居洪州、宣州，后为黄州、池州、睦州及湖州刺史，足迹遍及江南。江南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杜牧在江南时，沉浸于这里的山水美景，或出游，或登览。因此，在杜牧诗集中留下不少描写山水风物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七绝《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首诗写秋日里一次惬意的山间游览。

首句“远上寒山石径斜”，叙事以明题旨。“远上”指游处远离都市及人群聚居的村落，远离人烟。搜异必于遐远，探奇不避高峻，见出诗人出游的兴致。“寒山”点明时令，也是对秋山风物气象的简洁勾画。宋玉《九辩》咏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此著一“寒”字，萧瑟寂寥之意尽出。“石径斜”指山路的蜿蜒曲折。蜿蜒曲折的山路多为小径，车马不到，人迹罕至，而诗人轻车至此，更见高致。同时，蜿蜒所至之处其行必远，而景亦幽邃。首句叙事兼写景，为下文的叙写展开背景，作出铺垫。

次句“白云生处有人家”，写山行极目之所见。一片白云从山间升起，云起云涌处，见一带村庄，一时云遮雾障，村庄也时隐时现。在中国文士的心目中，白云意味着世外山林，是隐逸自由的象征。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赠诗以答》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陶渊明《归去来辞》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其中的“云”，无不寓意深远。山中人家，或耕种为业，或砍樵为生，远离尘嚣，与世相隔，如桃源中人。白云涌起，村庄隐藏于白云深处，显得缥缈似幻，如人间仙境，又如天上人间。诗人久困朝市，向往山林，一时出游正为超离尘世，摆脱烦嚣，山中白云，林间二三人家，正是诗人想象中的方外世界。登山临远，白云、村庄居然尽收眼底，欣喜之情何可言之。

如果说次句所见之景是诗人刻意搜寻之所得，那么三四句则是游历途中意外的偶遇。驱车山间小路，经过一片枫树林，此时日近黄昏，迷人的枫林晚景引得诗人停下车来，久久驻足观赏。只见一带枫林，满眼枫叶，经霜的枫叶殷红似染，洁净如洗，竟然比二月的红花还要红艳。诗人在萧瑟的秋天感受春天一样的美景，发现迷人的秋色胜似美好的春光，欣喜之情，赏爱之意，见于言外。春与秋，风物迥异，春天是花的海洋，秋天则是叶的世界，春天多姿，而秋天傲色，因此秋天也是色彩的世界，层林尽染，万山红遍，“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对深浓的秋色的赞叹。如果说春光娇艳，令人心动，那么秋色绚丽，使人沉醉，说红叶胜于春花，是对秋的意态、秋的风采的领略与偏爱。

自宋玉以来，在诗人笔下，秋天总是萧瑟凄清、寂寥冷落的。秋天万木凋零，百草摧折，一片衰飒肃杀景象，给人无尽的悲感。同样写枫林，写秋天的晚景，前代及同时代的诗歌总会染上一种萧瑟冷落的情调，如隋代李密《淮阳感秋》：“金风飒初节，玉露凋晚林。”初唐崔信明广为流传的诗句“枫落吴江冷”，还有杜甫《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不表现悲秋的主题。《山行》虽也写到秋天的冷落，但仅以“寒山”二字一语带过，与上引诗句有所不同，在杜牧笔下，枫林晚景绚丽迷人，毫无零落衰败之感。在诗人看来，秋天有着与春天不一样的美感，不一样的品格。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是成熟饱满，从容老健，秋如浓醪，令人沉醉。因此，与历来诗以悲秋不同，此诗意在赏秋。诗中赏秋并不始于杜牧，在此以前，刘禹锡诗已埋下伏笔，如《秋词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看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秋胜于春，壮秋赏秋，毫无悲秋之意。不管是刘禹锡诗，还是杜牧诗，爱秋赏秋无不出自诗人之高怀逸致。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评杜牧此诗说：“读此可见诗人高怀逸致，霜叶胜花，常人所不易道出者。”是的，常人无此胸次，故无此境界，自然不能道出如此流诵千口的名句。

《山行》既是一首诗，也是一幅生动的画卷。此诗叙事写景富有画意，宛如一幅逐渐展开的秋山行旅图。诗写诗人一路经行所见，其中第二句和第四句是笔墨着力之处，两句都富有画意，而视角、写法各不相同。第二句写山中白云，远处人家，为远景，可望而不可即。唯其深远，故生遐思逸想。第四句写枫林红叶，为近景。因在目前，故有赏玩之意。第二句因属远景，故从大处落笔，“有人家”三字，笔墨只在有无之间，勾画简洁。第四句因属近景，故从小处着眼，刻画精细。此外，第二句以“白云”为背景，笔墨清淡，第四句以“红叶”为着墨之处，浓墨重彩。前者仅用点染，后者则用泼墨，用笔不同，而相得益彰。两句所展示的画面，取景一远一近，层次分明，笔墨或淡或浓，相互映发，可见，此诗不仅具有画的意境，而且构图敷色十分讲究画的技法。

杜牧的绝句向来以爽朗俊逸著称，此诗写山行，景色幽邃明丽，致亦豪荡，宋人所谓“豪而艳，宕而丽”者，于此可见。诗之末句，一扫深秋萧瑟衰飒之气，于秋节感受蓬勃的春意，格调俊爽明朗，为神来之笔。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官箴 品鉴①

修身立德 公正廉明

——历代主要官箴说（书）举要

王杰

编者按：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修养与伦理建设，在国家治理、为官为政方面，千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经典论述，如“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公生明，廉生威”等，蕴含着丰富的修身内涵与政治智慧，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发掘其中的道德和智慧，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王杰在本版开设“官箴品鉴”专栏，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官箴进行解读，以资学习和思考。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系统中，很早就出现了一类为官者入仕必读之书即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廉洁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要想了解什么是“官箴书”，需要先从“官”与“箴”这两个字说起。

何谓“官”？“官”指的是在衙门做事的公职人员，也称官员，以区别于“吏”。“官”有职位品级之分，往往通过科举产生，经过朝廷委派，常常在异地任职，领取朝廷俸禄而为朝廷服务，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何谓“箴”？“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有“劝告、劝诫”的意思，与“箴”字搭配的词有：箴谏、箴砭、箴规、箴诫、箴诲、箴训等，主要含义就是劝谏别人改正过失，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守住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

何谓“官箴”？在各种辞书中，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指百官对帝王进行劝诫；二是指官吏对帝王所进的箴言；三是指做官的戒规。“官箴”原是规劝为官者的一些原则与规范，后来逐渐演化为带有自我约束功能的修身准则。

中国最古老、有文字记载、垂训千古的官箴，大约出现在殷商末期，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虞人之箴》了。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虞人之箴》，简称《虞箴》，是由一个叫辛甲的人推崇而名于世的。辛甲是谁？其身世已难以考证，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曾是商后期，也就是殷的亡国之君帝辛、人称纣王时期的史官。公元前1046年殷商亡国后，西周建立，辛甲在西周初年任太史，人称辛尹。他在太史任内，极力倡导百官“官箴王阙”。所谓“官箴王阙”，就是让百官作箴，或者让专司箴谏的官员作箴，箴文完成以后，由经常在君主之侧的乐工“诵唱”，让国君时时能听到百官的规劝，目的在于针砭国君的缺失，时时规范国君的行为。辛甲深感殷鉴不远，应以史为镜，以免历史悲剧再次重演。在辛甲的倡导下，百官都积极响应他的召唤，纷纷递交官箴。其中，有一份官箴特别引起了辛甲的注意，这就是《虞人之箴》。虞者，是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虞人之箴》不过60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这份箴言写道：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这段箴文大意是说，大禹时期曾有茫茫的疆域，他的儿子启登位后，划分为九州，设立了九牧，按地区管理天下，使得国家非常有秩序。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农业发展得也好，野兽有丰茂的青草，各得其所，因此互不干扰。后羿身居帝位后，贪恋狩猎，想到的只是飞鸟走兽，而忘记了国家的忧患，武事不能太多，太多就不能扩大夏后氏的国家。作为主管田猎的官员，谨以此报告君王左右的人。《虞人之箴》语言朴实，逻辑清晰，言简意赅。它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兽“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的思想以及不能贪恋安逸的思想。

后来，“官箴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了一些变化，但核心内容没有改变，既保留了对君王的规劝、劝诫，又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和规范。官箴书像一条红线，贯穿古代为官为政的始终，如：

《尚书·立政》有“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提出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

《周礼·天官》有“六廉”说：“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 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

《论语》有“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主张要“尊五美”，把“五美”看做人的五种基本美德。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除了五善，还有五失，指的是：自我膨胀、骄纵专横、越权行事、目无王法不知利害、轻贱有才能的人而贪婪财货。这“五善”“五失”就是秦国对官吏考核奖惩的标准。

汉代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汉朝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是“举孝廉”，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官员。

唐代有“四善二十七最”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四善”是说，唐朝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员，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最，是指各个职位的任职资格，二十七最，是指对各个职位不同工作的具体要求。

明代有“居官七要”说。明代大思想家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了“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

清代有“居官八约”说，这是康乾时期的孙嘉淦所提出，即“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短短的42个字，概括了事君、共人、避争、藏功、止事、要言、守独、清廉等非常丰富的内容，被后人看成是为官做人的八项基本原则。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官箴学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除了这些重要的官箴学说，《中国古籍总目》共列举了从汉到清官箴书目177部，如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宋代许月卿的《百官箴》、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等。时至今日，历史的滚滚车轮已经进入新时代，古代官箴中的一些内容早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与社会环境，但其中仍有很多跨越时空、具有时代价值的主张、观念和思想，这些正是古代官箴的精华所在。这些官箴精华，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讲政德、修政德、立政德，具有强大的精神哺育力量，是我们在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应当倍加珍视和注重发掘的宝贵思想资源。对古代官箴文化中适合于促进政治文明发展和鼓励干部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时代涵义。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包括官箴精华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组委会主任王杰]

中国历史研究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27”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

6月9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从中华文明源头汲取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力量，中华早期文明的特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议题交流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动承担起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崇高使命。会上，多位学者交流了学习体会。 **（张丽）**

“中国特色电影艺术观念的知识建构”线上开讲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第41期影视大讲堂“中国特色电影艺术观念的知识建构”在线上开讲。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院长、电影研究所所长吴冠平阐述了对电影知识的理解和对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秦喜清、编审类成云等也从不同角度对主题进行了阐释。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表示，针对中国特色电影艺术观念的知识体系建构这一命题，一方面要在艺术观念层面关注电影历史理论与知识谱系建构的本土化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立足于国际视域和历史视点进行考察和分析。

（郭海瑾）